

LI YU YAN JIU

李漁研究



黃 強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 陈庆惠

封面设计 凌瑛如

李渔研究

黄强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排版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328千 印数1—1500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8-270-1/I·157 定价: 15.50元

序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沉甸甸的《李渔研究》，是黄强同志积十几年之功写成的，是他十几年心血的结晶。据我所知，国内像这样系统全面研究李渔而且有一定分量的论著尚不多见。

提到李渔，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一个经常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门，靠打抽丰过日子，并且养姬蓄婢，带领由姬妾组成的家庭戏班四出娱人的旧时轻贱文人。这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但至少是表面的和不全面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封建正统派的歪曲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始用新的观念和视角审视李渔和他的作品，在看到 he 身上的确存在不少封建落后意识和旧习气的同时，更多地看到了他的才学和历史贡献，特别是他在戏曲理论和实用美学上的贡献，他在小说戏曲创作上的贡献，以及他在史学、社会政治等方面不同流俗的观点，有的研究者还把他誉为通俗文化大师。而对于他的落后面和复杂性，也开始从历史和他所处的时代方面去找原因，而不是简单地批判或臭骂一通完事。

李渔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几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和明代中叶之后的新兴市民意识在他身上都有着明显的反映，但从总体上看，李渔应属于李卓吾、汤显祖、冯梦龙一脉，在他身上有着比较明显的近代思想意识。因此，长期以来，李渔及其作品在国内外倒比在国内受重视，国外的李渔研究也

比国内来得活跃。国外不少著名汉学家，如美国的韩南，德国的马汉茂，俄国的华克生，日本的伊藤淑平、冈晴夫等等，都涉足李渔研究领域，并有丰厚的研究成果。而世界上第一部《李渔全集》不是由中国学者、却是由德国学者马汉茂编辑出版的。前些年我着手全面搜集李渔著作、重新编辑《李渔全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有感于此而作的。

国内最早对李渔进行系统研究的当推孙楷第先生，他在1935年为亚东图书馆重印《十二楼》所作的代序《李笠翁与十二楼》中，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李渔的生平事迹、社会交游、思想品格和创作生涯，可谓是现代中国李渔研究的奠基之作。但打那以后，直至“文革”结束时的近半个世纪，李渔研究处于极度零落的状态。从70年代末开始，在新的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和国外李渔研究的冲击下，国内的李渔研究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可喜的变化。黄强同志就是这十几年来李渔研究中脱颖而出的新秀。

黄强同志的这部《李渔研究》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几点值得称道：第一，过去的李渔研究大都集中在李渔的戏曲理论方面，也就是《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至多再加上园林艺术，也未出《闲情偶寄》范围，其他则很少触及，而本书可谓全面系统、全方位的李渔研究。收在本书中的30篇论文将近一半是作家、作品考，一半以上是作家、作品论，而后者又涉及到李渔的思想、理论、创作、杂著及其与古代文化的关系，如此内容丰富的作家作品研究不下大功夫是很难做到的；第二，本书在李渔研究方面有不少突破。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有的论题过去没有或很少有人做过，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拓，一是有的论题过去虽有人做过，但未做好做透，问题没有解决，而黄强同志把它解决了。前者的例子读者一看本书目录即可明了；

后者如《李渔移家金陵考》等几篇考证文章，确实解决了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至于书中对李渔思想、作品的分析，更是新见迭出，不胜枚举。第三，这部书不仅对过去的李渔研究成果注意吸收，而且对近年来的李渔研究动态反映敏捷，如对《龙门李氏宗谱》的质疑，对新编《李渔年谱》的斟酌，以及对《绣刻传奇八种》、《合锦回文传》、《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演义）》的考辨等，因此使这部论著极富新意。当然，书中有的观点或结论还有待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的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但以上所列举的几点长处，已足以使这部论著矗立于学术之林了。

我与黄强同志有过多次通信，但至今未曾谋面。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位很勤奋、很扎实的中年学者。几年前我在撰写《李渔全集》序的时候，关于李渔思想体系的一节，就曾受到他《李渔哲学观点与文学思想探源》的启发，在李渔移家南京的时间问题上，还借鉴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几次来信嘱我为他的这本书作序，盛情难却，便拉拉杂杂地写了以上这些话，就权充作序吧。

萧欣桥

1995年5月

目 录

序	萧欣桥
---------	-----

上编 李渔与中国古代文化

李渔的哲学观点与文学思想探源.....	1
李渔的戏剧理论体系	19
李渔论元曲	51
八股文与李渔的戏剧理论	
——兼论八股文与明清戏曲	68
李渔文学创作的虚构意识	87
李渔小说改编的四种传奇.....	100
李渔与养生文化.....	114
李渔与饮食文化.....	133
李渔与服饰文化.....	147
李渔与中医文化.....	163
李渔与中国古代性文化.....	179
李渔的园林美学思想.....	206
李渔的实用宽心术与心理疗法.....	225

中编 李渔生平考证

《龙门李氏宗谱》质疑	239
------------------	-----

李渔生平三考·····	252
李渔移家金陵考·····	262
李渔扬州事迹考·····	273
芥子园新探·····	287
李渔交游补考·····	303
《李渔全集·年谱》斟疑·····	313

下编 李渔著述考辨

李渔曲目的“前后八种”与“内外八种”·····	322
《绣刻传奇八种》非李渔所作考·····	331
《笠翁十种曲》序评者考辨·····	344
《肉蒲团》为李渔所作内证·····	356
李渔《无声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71
《合锦回文传》非李渔所作考·····	383
李渔小说三题·····	396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质疑·····	406
李渔著述四种考辨·····	416

附录：一部精心整理的大家全集

——评浙江古籍版《李渔全集》·····	438
后记·····	451

上编 李渔与中国古代文化

李渔的哲学观点与文学思想探源

明代中叶以后，经济领域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孕含着重大变化，哲学最先感受到时代的气息。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动摇了朱熹学派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发展了王阳明哲学的积极因素，李贽突兀而起，提出著名的“童心说”。以李贽学说的传播和影响为标志，晚明时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思想启蒙运动。与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紧密呼应，相互依托，文学领域中出现了以袁中郎为首的公安派反对复古派的文学革新运动。两者连同它们赖以产生的哲学思想基础一道，透露出近代人文气息，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因明清易代的历史事变而消失，特别是对于那些由明入清的文人而言，他们的世界观在明末已基本定型，不可能不受到晚明时代思潮的影响。李渔的哲学观点和文学思想就充分体现出这种影响。他的反传统思想，他那一一切领域中有感即鸣、自成一家的独特风貌，反对模仿、力主创新的强烈意识，都可以从这种影响中找到根源。就某种意义而言，李渔的戏剧和小说理论及其创作实践，是公安派文学革新运动在小说和戏曲领域中的延伸和发展。

李渔的哲学观点和文学思想

李渔是文学家，哲学思辨非其所长，但通览李渔全部著述，却不难把握他鲜明的哲学观点。正是最基本的哲学观点，决定了李渔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认识，决定了李渔的文学思想。

李渔的哲学观点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范畴，他凡事求之于自我之“心”，将许多现象归结于人的主观感受。如“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①。仿佛苦和乐均由自我想象决定，不存在任何客观性。宗教迷信中的鬼神，本是人由客观事物刺激后引起的主观意识的虚幻产物，李渔一概归结为自我感知：“善者敬神，恶者畏鬼，究竟都非异物，须知鬼神出在自心头。”^②在认识论方面，李渔主张格物穷理，所谓“世间万物，皆为人设。观感一理，备人观者，即备人感。天之生此，岂仅供耳目之玩，情性之适而已哉”^③？在《闲情偶寄·种植部》中，李渔时时以己心推及草木花卉，抒发感慨。在大多数场合，他的所谓格物穷理不过是为了启发印证我心固有之知，我心之理即万物之理。无怪乎他能以人心之情格出草木之情，甚至颇为认真地称杏树为“风流树”。由于崇拜自我之“心”，李渔提倡一种深入内省的道德修养，所谓“省躬罪己”，“忆苦追烦，引出无穷乐境”^④。凡此种种，始终不能免除唯心的色彩。李渔曾颇为自傲地宣称：“我之所师者心，心觉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于世何为乎？”^⑤这句话是概括李渔哲学观点的最准确的表述，其实质可一言以蔽之：“以心为师。”

“以心为师”这一由来已久的哲学观点被李渔用来观察一切，固然产生了唯心论所不可避免的先天不足，如上文所述李渔的苦乐观等等，但也确实使李渔的所有理论生机勃勃，洋溢

着个性气息，充满了创新精神。因为“以心为师”的哲学观点将人的天然本心视为个人对待世间万物的唯一和最高的准则，包含着破除对于圣经贤传的迷信，对他人的迷信，独立自主地认识世界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李渔决不以他人之是非为是非，也不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对被人奉若神明的圣贤，李渔毫不客气地指出：“圣贤不无过，至愚也有慧。”^⑥对于那些“依傍圣贤，袭取现成字句，到处攻人之短”的腐儒^⑦，李渔大不以为然。他说：“大凡拘儒论人，须是印板刊定之事，方为所取，苟无成样，未有不为所弃者也。可笑哉！”^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渔还说过这样的话：“天下之名理无穷，圣贤之论述有限。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方是名理，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使后世说话者如蒙童背书、梨园演剧，一字不差，始无可议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⑨这段精湛的论述说明李渔反对盲目崇拜圣贤，不承认圣人与普通人之间有绝对的界限。圣贤尚且无须盲目崇拜，他人就更不必说。

破除了对圣贤和他人的迷信，李渔毫无顾忌地抒发己见。在史学领域，他的疑古之论惊世骇俗：“予独谓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也”^⑩，“文字入情，即翻尽古来成案，天下不以为非，而且以为是”^⑪。一部《笠翁论古》“偏喜予夺前人，曲直往事”；“大约合于宋人者少，而相为犄角者众”^⑫。真可谓翻尽前人铁案。他称赞赵普为“古今第一宰相、第一谏臣”，是因为赵普提出“刑赏为天下之刑赏，人主不得以喜怒专之”^⑬。他推崇牡丹为花中之玉，是欣赏传说中牡丹敢于违抗武则天的旨意。由此李渔指出：“物生有候，蓂动以时，苟非其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后系人主，可强鸡人使昼鸣乎？”^⑭这些话无疑是对君权的某种藐视。

“以心为师”的哲学观点对李渔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奠定了

他的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什么是文章？李渔作过这样的解释：“文章者，心之花也；溯其根荄，则始于天地。天地英华之气，无时不泄。泄于物者，则为山川草木；泄于人者，则为诗赋词章。故曰：文章者，心之花也。”^⑥透过这种带有玄虚色彩的解释可以知道，李渔将文学视为天地英华之气注入作家心灵的产物。显然，李渔认为作家的主观心灵对其文学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所谓的“天地英华之气”绝对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的社会生活。由此可见，李渔在文学创作方面同样崇尚自我之“心”，主张文学应抒发作家的心灵，是心灵之“花”。作家“心觉其然，口亦信其然”，则笔亦信其然。这种崇尚主观心灵的文学观，决定了李渔文学思想的主要内涵：

一、文学是发展的，一代有一代之文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他比喻说：“文章者，心之花也……花之种类不一，而其盛也亦各有时，时即运也”，“经莫盛于上古”，“史莫盛于汉”，“诗莫盛于唐”，“曲莫盛于元”。所谓“时”、“运”，虽则语焉不详，但李渔已经意识到文学的发展变化有其必然性，“运行至斯，而斯文遂盛”，即使如君相之贵，也只能“起而乘之”，而不能“强不当盛者而使之盛”^⑦。

二、反对模拟，力主创新。在这一方面，李渔态度十分激烈。他不仅反对模拟古人，而且反对模拟今人，同时也反对别人模拟他。李渔曾说：“我行我法，不必求肖于人，而亦不求他人之肖我。”^⑧在李渔看来，“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⑨，在文学艺术上，“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乃是最没有出息的做法^⑩。李渔将自己的诗文集题为《一家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反对模仿，力主创新的执着态度。

三、抒发个人独特的情感。这是李渔反对模拟，力主创新的必然结果。写自己独特的感受，文思从自己性情中涌流而出，

作品必然会有自己的精神和个性。所以李渔极力主张笔写心中所有，“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非有摹仿、希冀于其中也。摹仿则必求工，希冀之念一生，势必千妍万态，以求免于拙；窃虑工多拙少之后，尽丧其为我矣。虫之惊秋，犬之遇警，斯何时也，而能择声以发乎？”^②类似的见解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上述三个方面自然无法包容李渔全部文学思想，但这三个方面涉及的都是文学理论最根本的问题，它们可说是李渔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精髓，李渔的戏曲理论、小说理论以及诗歌散文理论的其他许多方面都不外乎是这三个方面派生出来的。

李渔的著述完全吻合他的理论。其著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编选别人的文章、诗词而成的杂书。这类书有的固然有相当的价值，但既是编选之作，就不能视为自己的创作，李渔也并不看重它们。另一类就是著作，如《笠翁十种曲》，小说《无声戏》、《十二楼》，诗文集《一家言》、《耐歌词》，杂书《闲情偶寄》等等。小说、戏曲姑且勿论，其余诸种，诚如李渔自己所言：“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覬传于后，不过自成一家，云所欲云而止。”^③特别是《闲情偶寄》、《一家言》（诗文集）两种，最能见出李渔的真精神、真面目。李渔也颇引以为自豪。《闲情偶寄》“不载旧本之一言，以补新书之偶缺；不借前人之只字，以证后事之不经”^④，几乎在每一部中都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崇尚性灵，形成了李渔独特的文风。山水游记小品有自然真切之趣，无矫揉造作之病。《闲情偶寄》中的议论则写得轻松隽永，飘逸流畅；时而直抒胸臆，时而巧喻如珠，与舒卷自如、娓娓而谈的随笔一般，很能体现笠翁的个性。诗词不见得高明，但特点是坦率，性灵流泻，真情自见。别人心里想的有时耻于出口，但李渔坦然出之。如“我爱黄金天却吝，人恋乌纱神不

许”，“君辞厚禄，我钓虚名”等等。所以其婿沈因伯云：“然人所不肯言、不屑言者，皆其极肯为而极屑为者也。但诚于中而必不肯形于外者，何哉？欲知妇翁之为人，但观其诗文即燎然矣。”^②平心而论，李渔的人品不是没有可非议之处，但就总体而言，还是真率、爽豁的。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嗜好情欲、喜怒哀乐，沈因伯的话也不全是袒护妇翁之言。人品与文品固然不可等同，却也不可截然分开。李渔胸臆真率，性灵坦露，所以为文充满机智、风趣和豁达乐观精神。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发展的途程，李渔的哲学观点和文学思想令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其渊源并不遥远。

李渔哲学观点探源

李渔的哲学观点胎息于王阳明的“心学”。

对理学大师王阳明，李渔极为推崇。《资治新书》中明人案牍不多见，而王阳明却有二十八篇入选。李渔借此颂扬王阳明的“良法美政”。在《玉搔头》传奇中，王阳明被塑造成一个熟谙兵机、运筹帷幄的忠义之臣。该剧第十出《讲武》中，王阳明有四句上场诗：“庸儒个个说修身，大事临头辨始真。若使力行无实效，从前讲学尽欺人。”对此，李渔的好友杜濬评道：“四句道尽一生，可称二百年知己。”确实，李渔对王阳明的“心学”体会颇深。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纲领性的口号。何谓“良知”？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有这样的记载：“阳明登坛讲学，反复辨说良知二字，一愚人讯之曰：‘请问良知这件东西，还是白的？还是黑的？’阳明日：‘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点带赤的，便是良知了。’”这则记载本身证明李渔对王阳明的“良知

说”心领神会，而他从这则传说中所理解的王阳明的所谓“良知”，更接近人的血肉之“心”。李渔像王阳明一样推崇人的良知，认为良知是人先天具有的。他说：“谁无至性，谁乏良知，而俟予为木铎？”^②

王阳明强调的“致知格物”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③。如前所述，李渔对此深有契合，甚至自称“格物之笠翁”^④。他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显然来自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⑤，李渔“乐不在外而在心”的苦乐观不正与此“心有灵犀一点通”吗？他所说的“从来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⑥，与王阳明所说的“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意义何其相似乃尔^⑦。

将人之本心视为天地间至高无上的主宰，王阳明必然引出类似的结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⑧以此衡之李渔所说的“彼之所师者人，人言如是，彼言亦如是……我之所师者心，心觉其然，口亦信其然”，两者属于同一思想体系是不言而喻的。明乎此，李渔那样反对盲目崇拜圣贤，抨击在圣贤经典中寻章摘句的腐儒们，也就很可以理解了。按照李渔的逻辑，圣人能发现“名理”，普通人也能发现，而天下万事万物的“名理”恰恰是由绝大多数普通人发现的。后来者“无一字仿圣经贤传”，却也可“无一语非训诂典谟”^⑨。在这个意义上，普通人也就是圣人。这种见识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王阳明“满街都是圣人”的惊人之语。

王阳明力倡“心即理”的著名命题，使得“理”、“天理”不

可避免地植根于感性的血肉，从而客观上导致内在的自然、情感甚至欲望日益得到肯定。人欲开始摆脱天理的束缚，得到了应有的承认。这虽然是“心即理”这一命题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却又是晚明那一场“天理人欲之辨”的思想成果。历史发展到李渔时代，尽管明清鼎革导致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晚明“天理人欲之辨”的这一思想成果已经深入人心，在代表市民阶层利益的士大夫文人中影响尤为深远。李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对晚明时代氛围不无感受，笃信王阳明“心学”，虔诚地“以心为师”的他，顺乎自然地继承了这一思想成果。只不过李渔更多的是以小说和戏剧作品表现出对人的内在自然、情感和欲望的充分肯定，批判禁欲主义罢了。在李渔之前，“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三言》和《二拍》，广泛描绘了富有现实人情味的世俗日常生活，表现了各色人物的欲望和追求，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与《三言》和《二拍》相呼应，李渔更直露、更世俗化地肯定人的欲望，特别是人的情欲。他说：“‘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古之大贤择言而发，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数为是论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强之使无耳。”^②对那些禁欲主义者，李渔认为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怪物。他说：“若使杜情而绝欲，是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焉用此不情之物而作人中灾异乎！”^③对于那些彼此相爱而无法遂心如愿的青年男女，李渔怀着同情，规劝世人予以成全。在小说、戏剧中，李渔贯彻了类似的主张。男欢女爱是他绝大多数小说、戏剧作品的共同主题。将这些作品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应当承认它们肯定人的自然情感欲望、冲击封建礼教原则的历史进步意义、人文主义色彩。

与肯定“人欲”相适应，李渔的文学作品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诸多方面都有大胆的否定。他赋予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以超

越须眉的才华和心机，鄙视男尊女卑的传统习俗。在对封建婚姻观念的批判方面，他也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如《比目鱼》、《蜃中楼》等传奇，赞赏女主人公自择配偶，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不顾的举动。《凰求凤》中还出现了婚姻观念颇为开通的家长。父亲对女儿的婚姻大事“索性丢开，任凭她自家做主”；甚至鼓励女儿说：“你坚心自去求凤侣，怕什么越检弛维！”更有甚者，《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中的寡妇曹婉淑，完全抛弃了女子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主动追求意中人。

由于晚明思想启蒙运动所激起的浪漫洪流的高潮早已消失，李渔的小说、戏剧作品失去了《三言》、《二拍》中所特有的时代氛围，投射下了明清之际动乱时代的阴影，但在历史的系列链上，两者是衔接在一起的。反对禁欲主义，多方面否定封建伦理道德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在这方面，追根溯源，不可忽视王阳明“心学”的积极因素对李渔的影响。

在看到李渔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形成自己“以心为师”的哲学观点，导致他的文学作品充分肯定“人欲”，多方面否定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李渔的思想又颇为复杂，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从总体看，李渔反对禁欲主义，但有时他又劝世人严闺房之禁，使青年男女“不见可欲，其心不乱”^⑧。在《比目鱼》传奇中，男女主人公以死殉情，明明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叛逆，李渔却把这种刚烈行为纳入“维风化，救纲常”的封建道德范畴，称他们是“义夫节妇”。他的剧作写的大都是怜才好色的风流韵事，却偏偏要处处强调道学，说“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方才算得个学士文人”^⑨。

李渔创作小说、传奇是为了达到“正心”的目的。面对封建意识形态江河日下，已出现无可弥合的裂缝，李渔惊叹“风

俗之靡，日胜一日”，认为“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⑧。于是乎李渔以传奇代木铎，企图利用舞台劝善劝忠，移风正俗，然而，他在小说、戏剧中的实际描写所引起的阅读效果往往背离自己的初衷。甚至在一篇小说之中，主体故事的叙述彻底推翻了作者在开头的封建伦理说教。

像王阳明那样，李渔强调儒者应“修身”，却又懒于为此。他说：“能以种菊之无逸者砺其身心，则焉往而不为圣贤……乃士人爱身爱名之心，终不能如老圃之爱菊，奈何？”^⑨确实，李渔受不了“修身”的那份束缚，其立身处世的原则和生活格调，与标准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相去甚远。李渔自诩是孔子的信徒，但他的许多言论颇多离经叛道的色彩。

还可以举出一些。类似的矛盾绝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李渔提倡封建伦理纲常、封建道德修养，崇尚儒家，只是给自己新的货色贴上旧的商标。其实，即使是李渔自己也难意识到这些矛盾的存在。仍然必须从王阳明“心学”对李渔的影响中寻找李渔种种思想矛盾产生的根源。

王阳明本人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所倡导的“心学”虽然在多种意义上具有新的时代色彩，杂糅了产生在新兴经济形态上的市民思想的影响，但这一哲学体系毕竟是旧的哲学观和伦理观的继承与改造。王阳明强调“吾心”之“良知”，主观上是要求人的心理伦理化，所谓“破心中贼”，使封建伦理成为人的自觉愿望。“存天理，灭人欲”同样是王阳明信奉并极力提倡的封建道德教条。因此，感性自然的“心”与逻辑抽象的“理”调和在“心即理”这一命题之中，构成了王阳明“心学”体系深刻的矛盾。

李渔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自身同样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他是地地道道的“书商”，并兼